

引用:陈炬,庞尧斌,郭静. 基于源流探析君臣佐使配伍法[J]. 湖南中医杂志, 2022, 38(3): 91-93.

基于源流探析君臣佐使配伍法

陈 炬, 庞尧斌, 郭 静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75)

[摘要] 君臣佐使是中医学方剂配伍的基本原则,它论述了各药在方剂中的地位及配伍后的性效变化规律。君臣佐使配伍法经历了从药物分类到方剂配伍分析的历程,目前仅用于方剂的配伍分析,对于临床遣药制方并未能体现其指导意义,不能真正反映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使得君臣佐使配伍法陷入发展瓶颈。笔者通过参考医籍文献源流记载,分析并探讨符合实际应用的配伍法则,望为方剂配伍法的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关键词] 君臣佐使;配伍;源流

[中图分类号] R289.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2.03.029

“君臣佐使”是指导临床遣药制方的重要理论,当前药性配伍的研究及应用逐渐减少,临证用药趋向现代药理学,其原因除方剂配伍抽象复杂之外,还在于其配伍未能完全体现中医治疗的特点。君臣佐使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而对于“君臣佐使”的各自作用及数量也众说纷纭,故从文献记载中追溯其发展,寻找符合客观实际的配伍法意义重大。笔者通过全面收集与梳理古典医籍中的相关论述与记载,辨析源流,结合中医经方治疗原则,发皇古义,以期对方剂配伍理论的深入研究及其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君臣佐使肇始记载

“君臣佐使”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1]。其按照中药者上、中、下三品将“君臣佐使”分为“君”“臣”“佐使”三种分类,继而又言方剂中“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这一条历代版本各不同,日本江户时期森立之在《本草经考注》中对此条做了评述:“(宜用一君二臣五佐)立之案:五佐,《大全》本作三佐五

使。《千金》同《政和》本作三使五佐,并误。今据《真本千金方》皇国旧抄李唐原本及《顿医抄正》则与《至真要大论》文合。(又可一君三臣九佐)立之案:《证类》佐下有使也。二字今从《真本千金方》删正”^[2]。其认为各版本对此条的记载不同,是因为传抄过程中存在错简。由此可见,最早的“君臣佐使”有两种含义,一是用于中药三品的分类,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二是赋以方剂中君臣佐使的具体配伍比例。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记载:“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帝曰:三品何谓?岐伯曰: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3]。岐伯认为针对疾病的主药为君药,辅佐主药者为臣药,与臣药呼应者是使药,药物上中下三品的划分是用之以明善恶殊贯。唐·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注曰:“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所以异善恶之名位。胶饴之道,当为此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为佐,皆所以赞成方用也”^[3]。强调不可将药物分类之“君臣佐使”与方剂组成之“君臣佐使”混为一谈。《本经》中将其分为君、臣、佐使三种分类;而《素问》中只有君、臣、使三种分法,未提及佐药。面对这一分歧,森立之在《本草经考注》中云:“盖君臣佐使,本自有二义。一则上药君、中药臣、下药佐使,此是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873310)

第一作者:陈炬,男,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皮肤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通讯作者:郭静,女,医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皮肤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E-mail: 80620404@qq.com

品上之位阶;一则一君二臣五佐,又一君三臣九佐,此是一方上之位阶,分别如此。而佐使单言则云佐、云使,重言则云佐使,皆通。不可分称云三佐五使”^[2]。这是森氏在《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基础上做的注解,与岐伯的论点相似,认为君臣佐使分为“君”“臣”“佐使”三类,而方剂配伍中的君臣佐使不同于三品药的分法;佐使可合言,亦可单论,但对二者之间的区别未作明确解释。另外,《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君一臣三佐五”中提到佐,而后文“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中却没有对佐的解释,并且佐和使的概念很接近,因此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不足以指导用药。

2 君臣佐使药味数量

《素问·至真要大论》最先提到奇方和偶方,而后张从正在《儒门亲事》中讨论奇方和偶方时云:“君一臣三、君三臣五亦合阳之数也”“君二臣四、君四臣六亦合阴之数也”^[4]。即便奇偶方的产生受到古代官制制度的影响,如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发展,官僚机构也开始文武分列,产生文官的首长(相)以及武官的统领(将)等诸侯并列的社会现象^[5]。但是君王始终只有一个,方剂配伍也应当遵从这一模式,故君二、君三这种奇偶方的方式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梦溪笔谈》载:“用药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说,其意以谓药虽众,主病者在一物,其他则节级相为用,大略相统制,如此为宜”^[6]。沈括认为方中药虽多,但主药只有一味,二臣、三佐、五使的数量都是泛指,臣药、佐药、使药大致按照这一模式应用即可。

对于君臣佐使药味的数量众说纷纭。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掇。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1]。陶氏纵观历代诸方,认为配伍中应该遵循君药数量少于臣药、臣药少于佐药的原则,否则药势不均,不敌病势。继而又提出自己的观点:“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犹依本性所主,而兼复斟酌。详用此者,益当为善。又恐上品君中,复各有贵贱。”陶氏认为中药三品的“君”“臣”“佐使”同样可以用在方剂配伍上,君药是从养命之上品药中选取,臣药从养性之中品药中选取,佐药从治病之下品药中选取;每一品药又可分贵贱。这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的选药方式相比,愈

发脱离实际,而这样的分类配伍法会导致君臣药数量越分越多,亦不适用于临床。

3 君臣佐使选药原则

继“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本经》),“养命之药则多君”(《本草经集注》),“主病之谓君”(《素问·至真要大论》)之后,后世各医家分别秉持不同的观点,如《医学启源》云:“力大者为君”“为君最多,臣次之,佐使又次之,药之于证,所主停者,则各等分也”^[7]。张元素认为,君臣佐使药之间只是药力的不同;《脾胃论》载:“主病之谓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分治之,此治方之要也。君药分两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掇,则可以御邪除病矣”^[8]。李杲继承了《内经》的观点,认为君药对治主症,且用量最多,臣药、使药治疗兼症,且药量少于前者;张介宾《类经》云:“主病者,对证之要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两重,赖之以为主也。佐君谓之臣,味数稍多而分两稍轻”^[9]。张氏认为君药可以多于一味,将主病、味数少、量重同时应用于君药的选择上。《苏沈良方》曰:“《药性论》乃以众药之和浓者定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此谬论也”^[10]。沈括批判了《药性论》中把有毒药物列为使药的分类方法,这种批判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明·何璠《医学管见》曰:“医家有谓上药为君,主养命;中药为臣,主养性;下药为佐使,主治病。大抵养命之药宜多君,养性之药宜多臣,治病之药宜多佐使。此固用药之经,然其妙则未尽也”^[11]。何氏认为药性配伍虽早有记载,然其要义未尽,叙述不明,并做如下详解:“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明确解释了君药针对主症;臣药辅助君药;佐药与君药功效协同、药性相反,即为后世之反佐药、佐助药的范畴;使药为引经药。并举例说明:“如治寒病用热药,则热药君也,凡温热之药皆辅君者也,臣也。然或热药之过甚而有害也,须少用寒凉药以监制之,使热药不至为害,此则所谓佐也。至于五脏六腑及病之所在,各须有引导之药,使药与病相遇,此则所谓使也。余病准此,此用药之权也。”何氏对君臣佐使作出了突出贡献,是第一位将药性的寒热属性纳入到方剂配伍中的医家,同时也明确了君药是与病性相反性质的药物,臣药相较药力较缓。本书首次清晰

地界定了佐药的地位, 同时, 也使得使药作为引经药登上舞台。

现代《方剂学》^[12]教材认为君药是指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臣药指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主证)或针对重要的兼病(兼证)起主治作用的药物; 佐药分为佐助药、佐制药及反佐药; 使药分为引经药和调和药。根据以上对君臣佐使的分法, 极易导致处方中君臣区界限的模糊, 不少处方甚至主次不分, 构方无序。其除与现代处方常常较为复杂等因素外, 君臣佐使的构成原则不规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4 讨 论

“君臣佐使”涵盖了从药物分君臣佐使, 到方剂中药物的地位, 再到当前方剂配伍的原则。从历史源流中可以看出, 历代医家对于“君臣佐使”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与研究, 继《本经》提出后, 一直未成系统的应用方法, 张仲景在经典方书中也并未言明运用君臣佐使来配伍方剂, 只是后人运用君臣佐使来分析仲景方。目前“君臣佐使”配伍法多用于方剂分析, 对于临床遣药制方并未能体现其指导意义, 由于各个医家对君臣佐使认识均不同, 导致处方用药方式各有千秋, 疗效迥异, 故探索适用于符合实际应用的配伍法则具有重要意义。

辨证诊治和处方用药往往同步进行, 方剂配伍是辨证处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辨别阴阳寒热是中医学所独有的, 诚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善诊者, 察色按脉, 先别阴阳”, 明确了中医辨证的步骤中, 辨别阴阳首当其冲, 即分辨疾病的寒热属性。《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 “经方者, 本草石之寒温……辨五苦六辛, 致水火之齐, 以通闭塞, 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 以热益热, 以寒增寒, 精气内伤, 不见于外, 是所独失也。”遣方用药, 应根据疾病的阴阳状态, 在寒热属性相符的药物中寻找, 其次才是药物主治、药物性味的甄选。有学者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技术探究典型热性、寒性药对正常大鼠代谢的干预作用, 初步揭示了中药寒、热、温、凉四性同机体能量代谢的关系, 发现寒、热中药以影响大鼠能量代谢为其主要特征^[13]。

全小林认为, 依据主治为君、兼治为臣、八纲为佐、引经为使的原则, 选择对疾病有靶向治疗作用的中药或中药功能团作为君药, 以对君药有协助作

用的中药或功能团作为臣药, 再根据病性之寒热虚实属性选择佐药, 先定君, 再定臣, 后定佐使, 可使处方在不脱离辨证论治基础上, 组合有序, 以实现针对现代疾病的靶向治疗^[14]。笔者认为, 君臣佐使在历代的发展中臻于完善, 目前急当弥补现行教材中未将药性寒热属性纳入的不足, 将君臣佐使配伍法从方剂分析的应用层面上升到临床实际的遣方用药中。而规范君药应具有以下特点: 与疾病性质相反的药性,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针对主证功效最大, 满足“主病之谓君”; “用药为君最多”, 这里应当是药量为多, 数量唯一。臣药仅次于君药, 需要满足与君药同样的寒热属性, 功效上协同。佐药需满足两个特性: 其一, 功效与君药方向一致, 寓意佐助; 其二, 寒热属性与君药相反, 起反佐作用。使药寓意“使者”, 作为方中的引经药, 引导药力直达病所。循用此法, 简单明了, 即使应用于临床大处方亦能井然有序, 易于分析, 不失为一种简捷易行的临床配伍之法。

参考文献

- [1]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7-9.
- [2] 森立之. 本草经考注[M]. 吉文辉, 宋立人, 张敏, 等点校.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8.
- [3] 程士德. 素问注释汇粹[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62, 455.
- [4] 张子和. 儒门事亲校注[M]. 张海岑, 赵法新, 胡永信, 等校注.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126-138.
- [5] 马思思, 贾春华, 郭璠. 基于“一个方剂是一个邦国”的方剂君臣佐使隐喻分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42(2): 93-98.
- [6] 沈括. 梦溪笔谈[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4.
- [7] 张元素. 医学启源[M]. 任应秋,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8: 164.
- [8] 李东垣. 脾胃论[M]. 张年顺,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8.
- [9] 张景岳. 类经[M]. 范志霞,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5: 394.
- [10] 沈括, 苏轼. 苏沈良方[M]. 杨俊杰, 王振国, 点校.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123.
- [11] 何塘. 医学管见[M]. 郑金生, 主编.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165-166.
- [12] 段富津. 方剂学[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8.
- [13] LIN JH, LU AY.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inhibition and induction of cytochrome P450 enzymes[J]. Annu Rev Pharmacol Toxicol, 2001, 41(1): 535-567.
- [14] 全小林, 刘文科. 君臣佐使理论的再理解及其在现代临床处方中的应用[J]. 时珍国医国药, 2015, 26(8): 1969-1970.

(收稿日期: 2021-04-19)